

清末民初浙江报人^①的办报实践与特征

——专业期刊起步与身份的非职业化

周 军

摘 要：清末至辛亥革命时期是浙江新闻报刊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的报人通过报刊活动进行维新传播和革命传播，成为浙江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光复革命的舆论先导，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同时这一时期的报人集多种社会角色于一身，报人、报刊均与政治活动紧密相关，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报人群体和报业发展所显示出的非职业性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清末浙江报人；报刊活动特征；非职业性

作者简介：周军，女，讲师，浙江大学新闻学硕士生。（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浙江 宁波，315100）

中图分类号：G21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2)03-0037-06

1873年艾小梅在武汉创办《昭文新报》，标志着外国人在中国主导言论传播的时代宣告结束，从此，国人办报高潮迭起。清末国人办报的第一个高峰期为1895—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这一时期国人办报数量大增。据统计，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末，国人在国内创办的中文报刊数为267种，^{[1](76)}其中1895—1898年间，全国出版报纸120种。^{[1](92)}第二个高峰期为1906—1911年清政府预备立宪到辛亥革命爆发前，新办报刊多达800多家，足见办报风潮之盛。^{[1](114)}清末至辛亥革命时期浙人创办的浙江报刊是当时整个国人办报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学者统计，在1895—1898年国人办报的第一轮高潮中，报刊分布广至全国20多个城镇，其中上海最多，有40多种，浙江紧随其后。^{[1](93)}浙江地区第一份国人创办的报纸是温州人陈虬主编的《利济学堂报》，诞生于1897年1月20日，它标志着浙江在清末报纸风起云涌的时代里进入了近代报刊传播时期。据不完全统计，1897—1911年，浙江人创办的浙江报刊大约有45种，主要集中在杭州（21份）、宁波（6份）、绍兴（3份）三地，其余零星散落于温州、湖州、衢州等地，这些报刊绝大多数是民间报刊。^{[1](359-361)}在中国报业的初创时期，浙江籍报人的报刊活动与清末社会政治变革紧密相关，具有鲜明的维新色彩和革命特征，言论改变社会的报刊功能被这一时期的浙江籍报人发挥得淋漓尽致。浙江籍报人通过报刊传播推进了浙江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国近代新闻纸的勃兴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而这一时期浙籍报人所显示的非职业性特征也成为中国新闻业初创期的历史缩影。

一、清末民初浙江籍报人的办报实践和主要特征

甲午战争失败后，举国上下一片哀痛之声，康梁维新变法运动乘势而起，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随之而来。康有为、梁启超创办的《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倡导“开风气、变官制、倡新

基金项目：2011浙江省社科联社科科普课题《浙江近代报人传略》（11ZC43）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本文所述的“浙江报人”是专指在浙江地区进行办报活动的浙江籍报人。

学”，影响卓著，上至朝廷官员，下至士绅举子，均感切中时弊，顺应人心。尤其是《时务报》，因为有梁启超那支“笔锋常带感情”的豪健之笔和犀利精锐、耳目一新的言论文章，而广受读者欢迎，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改革派在中国社会首先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思潮启蒙运动，自此，全国各地维新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西学启蒙的浪潮汹涌澎湃。早期洋人报刊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实践已经明确地告诉维新改革者，报刊是改变人们观念、促成人们行动的最有效方式，因此甲午战争之后，各地具有维新思想的报纸层出不穷。据记载，从1896年《时务报》创刊，到1898年戊戌政变的两年多时间里，全国新办报刊达70多种，是1895年以前国人报刊总数的两倍多。这一时期，浙江籍报人创办的报刊数量虽未拔得头筹，但也可算后来居上，有不少报刊还占有新闻史之最。

（一）浙籍报人创办一系列专业报刊，揭开浙江新闻史第一页

浙江近代报刊兴起于专业报刊的创办。1897年，瑞安人陈虬创办《利济学堂报》，这是浙江最早的国人所办报刊，也是迄今为止可知的全国创办时间最早的医学专业报刊。《利济学堂报》是半月刊，每册50页，全年24册。《利济学堂报》不仅是医学专业报刊，而且也是报道时政的综合性报刊。《利济学堂报》上传播医学知识文章大都由利济医院学堂的师生撰写，既传播医学知识，又切磋医术医技；《利济学堂报》诞生于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时期，因此对维新时政的报道是该报的又一个主要内容，占据了报纸大量篇幅。除了论说外，《利济学堂报》设有“时事鉴要”、“见闻近录”、“近政备考”、“学部新录”、“格致卮言”、“洋务掇闻”、“商务丛谈”、“农学琐言”等多个栏目，摘录当时京、沪、穗等地卓有影响的报刊上关于农、学、工、政、商信息给予报道，特别选刊列强侵华、国势危殆的报道，旨在推行新政、挽救国家。报馆设在温州府前街，并在杭州、宁波、兰溪、衢州等地建有分馆，其售报点，省内外多达六十多处，发行至京、津、沪、穗等大城市和香港、澳门，发行量最多时达到2000份，梁启超、汪康年、谭嗣同等维新派重要人物都读过《利济学堂报》。

继《利济学堂报》后，1897年6月，温州黄庆澄创办了《算学报》，这是国内最早的数学科普报刊，专门介绍各种数学知识，是系统的数学专业报刊。主编者力求“浅之又浅，简之又简，即素不有算者，开卷之余，亦明如指掌”；1899年黄庆澄又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史学专业期刊《史学报》，每月出一册，专门介绍中国史、西洋史、日本史以及中外政治家言论等。

浙江以专业期刊首先亮相于新闻舞台，与这一时期国内特别是京沪等地西学兴起，有识之士能够阅读到大量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译著有关，这一时期也正是浙江传统学术走向近代新学术转型的时期。甲午战争后至19世纪末，浙籍学者创建了“农学会”、“算学会”等以研究新学术为核心的学术团体，如“兴浙学会”对政法、艺术、舆地等各学科“一律研求”^[3]。因此，浙江专业报刊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浙籍报人得风气之先，重视科学、追求理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浙人自清以来倡导经世致用、注重实学的地域性传统特征的显现。这与京、沪等报刊事业发达之地报刊的起始是不同的情形。

（二）浙籍维新派报人传新学、开民智，推动浙江现代化的进程

浙江近代报刊的初创期主要是由具有维新变革思想的维新派报人唱主角，他们创办了一系列具有西学启蒙、昌言变法革新性质的进步报刊。从1897年开始，浙江主要的维新报刊有：《利济学堂报》、《经世报》、《算学报》、日商《杭报》、《宁波白话报》、《史学报》等。1897年7月，兴浙会成员胡道南、童学琦创办了《经世报》，维新名士章炳麟、陈虬任主编，旬刊。《经世报》是清末浙江较早的综合性报刊，也是浙江早期著名报刊之一，旨在“鼓吹新政、宣传维新变法”。《经世报》第一册就登载了章炳麟的《变法箴言》。马绩甫等创办于1897年11月26日的日商《杭报》是浙江最早诞生的日报新闻纸^[4]，该报虽然还设有“上谕”、“辕门抄”等旧式邸报栏目，但是报纸以“中西要事”、“各国新闻”、“各省新闻”和沪杭市场行情等栏目为主要内容，日商《杭报》在其发刊第2期头版《本馆例言》中，明确报纸为维新服务：“方今中国时事多艰，内外臣工力图振作，凡有益中国之事，悉仿行西法，次第奏请举行。本馆深体此意，每日附张搜择，有关时务之书，排印一二页，标明书目，积久可

以装订成书，俾有志时务者，随时浏览，用资考证。”^{[2](23)}1903年农历10月初五，宁波旅沪同乡会创办了《宁波白话报》，社址在上海四马路惠福里，主要在宁波发行。该报以“开通宁波之民智，联合同乡之情感”为办报目的，初设有“论说”、“新闻”、“评论”、“专件”、“指迷录”、“调查录”以及“小说”、“歌谣”等栏目，后增加“历史”、“地理”、“实业”、“格致”等内容，“改良风俗，提倡科学，祛除迷信”是《宁波白话报》的传播宗旨。《宁波白话报》着重宣传实业救国，倡导维新，激发民众爱国心和自强意识，是一份比较温和的维新改良报纸。

此外，浙籍有识之士于1897—1898年还先后创办了《杭报》、《平湖白话报》、《笑林报》等多种报刊，正如黄庆澄述及创办《算学报》的目的时所说：“窃惟时局艰迫，外患迭乘，海内之士始知言学。庆澄自渐弩劣，无裨于时，爰竭绵，特创兹报。冀为格致之权舆，以辟黄人之智慧，负山填海，讪笑不辞。”^[5]这些报刊都是以“开通风气”、“倡导新学”、“启发民智”、“宣传维新变法”为己任，这一时期浙籍报人的报刊活动促进了浙江地区现代化的进程，强化了浙人维新强国的意识，为浙江地区革命报刊兴起和浙江光复革命奠定了社会变革的思想基础。

（三）浙籍革命派报人反清廷、促爱国，建构浙江光复革命的社会舆论空间

1900年以后，浙江地区革命报刊风起云涌。浙江是清末光复会、同盟会活动的主要地区，革命党人数众多，传播革命思想的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据统计，1900—1911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前，浙江先后创办的各类报刊共50家左右，革命报刊和进步报刊约在30种以上^{[2](30)}。革命派报刊主要传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抵御外辱”的思想，其中省内各地诞生的白话报成为革命报刊的先声，最早诞生的就是由维新报纸转变为革命报纸的《杭州白话报》。1901年6月20日项藻馨创办了《杭州白话报》，创刊初期，《杭州白话报》以“开民智和作民气，两事并重”为宗旨，着眼思想启蒙，强调“维新两字，是生死攸关”的，属于维新报刊。1903年夏，富有反清革命思想的杭州人孙翼中赴日留学回杭，此时项藻馨已任杭州私立安定学堂监督，无暇兼顾报务，他力邀孙翼中加盟，孙成为《杭州白话报》的经理兼主笔。孙翼中进入《杭州白话报》后，不久加入光复会，《杭州白话报》反清、革命的立场日益凸显。《杭州白话报》激烈抨击清廷朝政和吏治的黑暗腐败，同时揭露外国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杭州白话报》遂成为光复会的舆论机关，发行量为2000份。

1903年7月，身为光复会会员和同盟会会员的绍兴人王子余在绍兴府城仓桥街创办了《绍兴白话报》，当时同为同盟会会员的陈公侠、蔡元康共同参与了创刊，徐锡麟也出资大洋一百资助办报。以“唤起民众爱国，开通地方风气”为办报宗旨的《绍兴白话报》，致力于用白话文进行革命宣传，它设有“论说”、“大事记”、“中国近事”、“外国近事”、“绍兴五千年人物谈”和“小说”等栏目。1907年，绍兴革命党人准备“新年会”，推选王子余为干事，《绍兴白话报》遂成为革命派的机关报。该报发行除了绍兴府治各县外，还分销宁波、杭州、上海、福州、北京等地，时人称为绍兴“鼓吹革命的先声”。^[6]

1904年5月15日史庚身、汤济沧、杨辛粗、张稼庭、潘芸生、汪铁群、钱玄同等创办了《湖州白话报》，该报反清、革命的倾向非常鲜明，明确提出：“扬大汉之天声，述亡国之惨史”，积极宣扬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主张，创办者中大多有留学日本的经验。除此而外，浙江先后还有1904年金涛欤创办的《南浔白话报》、许祖谦于1908年创办的《浙江白话报》、杭辛斋于1910年创办的《白话新报》。后两报都反对帝制，传播维新思想，倡导实业救国。杭辛斋1908年加入同盟会，由维新派变为革命派，1911年底，杭辛斋将《白话新报》与许祖谦的《浙江白话报》合并，改名为《浙江白话新报》，由杭辛斋任经理，许祖谦为主笔，力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

进入20世纪后，浙江地区形成了从维新派报刊一统天下转变为革命派报刊主导天下的传播局面。除了白话报之外，一些地方报纸在倡导反清爱国、暴力推翻清廷中亦不遗余力，影响卓著，其中最为著名的要算金华张恭创办的《萃新报》和宁波革命派报人创办的《朔望报》与《武风鼓吹》。

1904年6月27日，光复会成员、革命党人张恭在金华创办《萃新报》。《萃新报》设有“论著门”、“言论编辑门”、“时事编辑门”和“附录门”几大类，包括社会、哲理、政法、教育、军事、文

学以及内政、国际、学界、实业等方面的信息,《萃新报》以“开通民智”为宗旨,积极鼓吹民主共和,严厉抨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和西方侵略势力。

1911年6月望日,宁波人应彦开(笔名天恨)创办了《朔望报》,此报为双月刊,由宁波朔望报社发行。《朔望报》第一期“本报章程”中明确提出了刊物的办刊宗旨:“本报以唤起国民爱国思想,鼓励国民尚武精神,灌输学术,针砭社会为宗旨。”《朔望报》的体例有“社论”、“学艺”、“学说”、“短评”、“小说”、“史传”等。其中“社论”、“史传”、“学说”主要宣传尚武精神,传播西方思想,鼓动民众爱国御敌,文字中也暗含了强烈的反清色彩,比如“史传”中的“中国者钱忠介公肃乐传”,钱肃乐是宁波家喻户晓的明末抗清英雄,报纸刊登这样的史传,反清的含义不言而喻。

1911年9月,由同盟会会员陈训正等人发起,宁波国民尚武分会创办会刊《武风鼓吹》。《武风鼓吹》主编是章闾,字叔言,又字巨摩,热心革命。《武风鼓吹》在传播尚武思想的同时,输入西方学术,抨击专制统治;在宣传军国民思想的同时,激发民众爱国情感和反满抗击列强的情绪,并渗透激进的革命思想,为鼓动民众革命意识,凝聚民间的革命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任宁波国民尚武分会副会长林端辅回忆:“《武风鼓吹》出刊后,数量日增,宁波各界人士、青年莫不争相购,先阅为快,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于革命事业有极大的贡献。”^①

(四) 清末民初的浙籍报人多为学养深厚、学术或专业声望高的社会精英

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认为:“汉族革命之所以成功,其原因甚复杂,然报纸之提倡不可谓非重要原因也。”^[7]精英办报是浙江晚清至辛亥革命时期报人活动的显著特征。不论是“倡新学、变官制、开民智、作民气”的维新派报人,还是高举“激扬武风、推翻清廷、抗御外辱”的革命派报人,都是当时浙江的文化精英。略有差异的仅在于,维新派报人为旧学学养深厚,且拥有较高学术或专业声望的知识分子,他们中多数人都有科举功名,如汪康年、宋恕、陈虬、黄庆澄等;革命派报人则大多有游学欧美和日本的经历,他们既谙熟旧学,又了解西学,站立时代的潮头,如章炳麟、孙翼中、陈训正等。而这一时期促进社会变革的报纸主要是由维新派报人与革命派报人前赴后继所办,这两个报人群体为推进近代浙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为浙江地区光复革命的成功进行建构了社会舆论氛围,奠定了社会思想基础,聚集了社会民众力量,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二、清末民初浙江籍报人社会身份的非职业性

清末至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籍报人对浙江的社会革命和浙江的现代化进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这一时期的报人及报刊活动也体现出明显的非职业性特征。

(一) 报人社会身份多元化,报刊传播尚未成为报人专门的职业

如前所述,清末至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地区的报刊创办者大都是具有强烈的维新或革命意识的精英文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参加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也不在少数,他们积极接受并传播西方科学思想和文明观念,其中不少人还有留学日本或欧美西方国家的经历。他们虽然办报,但报人不是他们唯一的社会角色,他们大多身兼数职。比如《利济学堂报》的创办者陈虬,少年勤奋好学,后致力研究医学,26岁就立医案,为人治病,30岁著《蜚庐珍录》,医名大噪,成为当地著名的中医大师,1885年创办利济医院,并在医院内设立利济学堂,自编《利济教经》为教科书,培养医学人才。陈虬力主维新变法,撰写《治平三议》、《医院议》等社会改革文章,1890年,陈虬在进京会试不第返回途中,专门拜访山东巡抚张耀,上书条陈变法八事,首先提出“创设议院以通下情”。1893年出版《治平通议》,列举14条富策、16条强策、16条治策,广受社会重视,被梁启超列入《西学书目表》,是浙江著名的维新派人士。1897年46岁的陈虬,设立利济学堂报馆,自任主编,同时任杭州《经世报》主笔,积极倡导救国自强,1898年加入北京京城报国会。因此清末的陈虬既是医生、院长、校长、社

^① 林端辅口述,何雨馨整理《宁波光复亲历记》,《宁波文史资料》(第十一集),第46页。

会改革家，又是报人，社会角色多元，报刊活动只是其社会变革活动的一部分。在清末浙江，身兼多种社会角色的报人不止陈虬一个，如黄庆澄是中国第一本数学启蒙读物《算学报》的创办者，同时也是民间数学家、坚决的维新派人士，创办《算学报》是因为“唯时局艰迫，外患迭乘”。又如宋恕，既是《经世报》主笔，著有《六斋卑议》，又是清末浙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求是学堂总教习。宁波人陈训正是革命报刊《武风鼓吹》的创办者，他也是同盟会会员，并担任着宁波教育会副会长、西学翻译等。这些精英知识分子都具有多重社会角色，他们通过报刊活动将自己投入到社会变革大潮中，但在他们的意识中并未明确地将报刊传播作为一种专门从事的独立职业。虽然陈虬创办了浙江最早的报刊《利济学堂报》，但办报并不是陈虬的主要职业，更不是陈虬的唯一职业，考察陈虬的生平和著述，对报人的职业意识并不清晰，办报活动只是其改革国家、拯救危局的社会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二）报人以报为终身职业者少，先报后政或先报后商者多

清末报人职业特征的不足还表现在只有少数报人是终身以报为业，大多数报刊创办者的最终归宿往往指向仕途或者商界。如，《杭州白话报》创办人项藻馨，在主持《杭州白话报》时便已兼任杭州私立安定学堂监督，因此无暇顾及报务，于是介绍日本留学归来的孙翼中加盟《杭州白话报》，项藻馨则赴任杭州中国银行分行行长。《绍兴白话报》的创办者王子余，早年中秀才，光绪二十八（1902）年是会稽县学堂督办，同年在绍兴仓桥街开设万卷书楼书店，创办《绍兴白话报》后，成为光复会会员，后又加入同盟会，参与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组织的反清政治活动。辛亥革命绍兴光复后，王子余任绍兴军政分府总务科科长，民国元年（1912）被委任为嵊州光复后第一任知事。王子余是典型的亦官亦商亦报，具有官员、商人、报人、革命者多重身份。宁波《武风鼓吹》的发起人陈训正，在清末曾参与多份进步报刊的主编和创办，是晚清较为活跃的浙籍报人，北伐军攻克浙江后，则出任浙江省委员、杭州市市长、浙江民政厅代理厅长、西湖博物馆馆长等职。

报人从政在清末中国报刊事业起步时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浙江籍报人亦不例外。当然，这一现象的背后并不一定都是报人们有意设计的“终南捷径”，而是有着令报人们十分无奈的社会原因。比如，清末报人的社会地位仍然比较低，社会名誉度不高，左宗棠曾经以“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来诬蔑报人，因此想让这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渴望通过参与社会变革而一展抱负的知识精英安于报人之职，实属“委屈”。加上清末大多数报人脱胎于旧式文人，仍然追求“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人生理想，因此创办报刊，宣传政治主张，完成救国存亡的使命，然后踏入政途，就成为报人职业选择的正常路径。另外，浙江报人创办的报刊多为民间报刊，办报经费往往都是报人自筹，清末商业经济并不发达，广告来源少，报人办报经费来源无着，也是报人职业生涯善始而不能善终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上这些方面是这一时期报人职业意识淡薄的重要社会原因，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一时期报人尚不具有新闻主体意识，缺乏对报刊主体独立性的认识。

（三）报人依附政治，传播工具性强，传播主体的独立性地位尚未确立

清末浙江报人职业意识尚不够发达，还表现在报纸创办者对报刊传播功能认识的局限性上。清末国人办报高潮源起于维新派和革命派为了挽救濒临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而进行的社会变革运动，报刊传播自上而下，是维新派和革命派以清廷官员、广大读书人、普通民众为对象的观念传播活动，而不是报人为满足民众自身信息需要的报刊传播，因此报人的报刊活动带有较强的“工具化”色彩。自1897年浙江第一份报刊《利济学堂报》诞生，维新报人以变法维新、改革政治、抗御外国侵略为办报目的；革命派则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主要办报目的，报刊均成为不同社会政治势力的宣传工具和言论工具。而报人以社会改革为目标，他们的报刊活动成为其实现社会政治变革的一个手段，清末至辛亥革命期间，许多报刊成为社团组织的言论机关即是最好的明证，如《经世报》是杭州兴浙会的会刊，该会发起人之一是章炳麟；《杭州白话报》在孙翼中的主持下，成为光复会的言论机关；《绍兴白话报》是绍兴光复会的会刊，该会成员曾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宁波《武风鼓吹》是宁波同盟会国民尚武分会的会刊，该会直接受上海同盟会领导，其成员有赵家艺、陈训正等，都是同盟会会员。这些报刊都有着很强的政治色彩，编撰以上报刊的报人也无一不是当地叱咤风云的政治活动人

物。因此,这一时期的报人一方面尚未确立报刊传播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没有意识到报人自身在传播中的主体性。报刊传播活动缺少新闻职业的独立性,报人跻身或依附于政治活动的特征较为明显。特别是到了民国初期,浙江报人跻身政坛的现象尤为显著,项士元在《浙江新闻史》中谈到:“所谓报馆经理或主笔,类多带有省议员之头衔”。^[8]可见报人从政在当时亦是一种普遍现象。

此外,清末浙江报人职业特征不够鲜明还体现在报人报刊业务上的非专业性。如,对报、刊界限的混淆,一些称为“报”的面貌更接近期刊或书册,与现代意义的报纸尚有一定的距离。还有的报纸仍保留古代报纸中的“上谕”或“辕门抄”等栏目,更是离现代报纸相去甚远。报刊语言不够简洁明朗,有的报纸依然是古文,有的虽然用白话文,但语言繁杂啰嗦。清末至辛亥革命时期是浙江报纸新闻传播的初创时期,报人经营报刊的经费大多自筹,且不充裕,因此,缺少大张报纸的印制;这一时期也是科举制废除前后的时期,报刊语言正处于由文言向白话过渡阶段;加上清廷虽已处分崩离析状,但清朝统治还没有完全失去作用,报人们有时不得用“旧瓶”装“新酒”以保护自己,因而出现了种种新闻业务上的非职业性表现。

三、结 语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浙籍报人的报刊活动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并非源自于报刊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它不是为了满足大众接受信息的需求,而是在“救亡图存”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展和演进的。因此,创办报刊以改变国人思想、促进社会变革的政治诉求成为这一时期浙江报人报刊传播活动的根本动因。同时清末民初,浙江地区又是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党人的主要聚集地,报人及其报刊活动深受大环境的影响,具有浓烈的政治特性。而此时对报刊主体性及报人的主体地位的认识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因此这一时期浙江报人报刊活动的非职业性特征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看亦是难以避免了。

但是,清末民初浙江报人的报刊传播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历史价值。首先,清末民初浙江报人以创办传播医学、数学等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专业期刊开启浙江新闻传播历史,显现出浙籍报人得风气之先而注重科学传播,彰显出较强的科学意识和理性色彩。浙籍报人由科学传播进而趋向维新启蒙再到革命传播,形成了这一时期与众不同的报刊传播特色。其次,这一时期浙江报人虽然尚不具备明确的职业意识,但是报人对报刊舆论的传播功能已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并有意识地运用于报刊传播实践当中,浙江报人传播内容的演变紧紧契合社会时代的历史演进,为浙江光复和促进浙江近代化进程均发挥了强有力的舆论建构作用。第三,清末民初的浙籍报人群体特征鲜明。这一时期活跃于杭州、宁波、绍兴等浙江各个地区的浙江报人数量众多,且多为社会精英,具有很高的学术素养和社会声望,他们秉承传统知识分子济世救民的传统,不避艰险,不计利害,创办报刊的目的是改造社会、拯救危局、富国强民,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言论改变社会是这一时期浙籍报人报刊活动的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 [1] 陈昌凤. 中国新闻传播史[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 [2] 王文科,张扣林. 浙江新闻史[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 [3] 汪茂林. 从传统到近代:晚清浙江学术的转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1.
- [4] 张梦新. 杭州新闻百年史纲[M].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8.
- [5] 黄庆澄. 公启[J]. 算学报,1897(1).
- [6] 浙江省新闻志编纂委员会. 浙江省新闻志[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63.
- [7] 东南报界同志注意[N]. 汉民日报,1911-10-07.
- [8] 项士元. 浙江新闻史[M]. 杭州:杭州之江日报社,民国十九年(1931):68.